

#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乔治 G. 伊格尔斯 王晴佳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 历史系; 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 历史系)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08)01-0001-11

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1989—1991 年之间)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在苏维埃共产主义解体后,世界各国将逐步接受美国模式的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但世界和平并没有按照福山预言的那样得以实现。事实上暴力和冲突一直标识着 1989 年后的国际关系,只不过这时候的冲突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发生在国家与国家实体之间,例如即使越战也仍然涉及美国 and 北越国家间、军队间的争斗。1989 年后的暴力冲突,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巴尔干地区,以及前苏联亚洲加盟国地区,乃是使用恐怖主义非传统武器,与没有明确边界的非国家实体敌人的斗争。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曾写到伊斯兰和西方文化(他也偶尔提及中国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过于简单化地把伊斯兰看作一种没有时间的整体文化,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内的一致性、忽视了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现代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经济要素所起的作用,以及伊斯兰社会和现代西方的互动关系。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福山的预见至少有些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扩张到世界上各大地区。这种扩张从 1989 年以前就开始了,并成为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但是除了台湾和韩国这样少数的特例外,全球化并没有引起民主化。全球化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新信息技术强化了这种经济变革,而且引起了日常生活、消费习惯、城市化模式、都市建筑、影视音乐流行文化,以及性别和家庭关系意义上的同质化或标准化(homogenization)。然而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全球化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形式,反映出各地环境和传

[收稿日期] 2007-11-20

[作者简介] 伊格尔斯(1926-),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杰出荣休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思想史、史学史;王晴佳(1958-),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史学史、史学理论。作者在此感谢苏皮娅·玛克赫吉(Supriya Mukherjee)对本文写作的热情帮助。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6(1989年夏季),3-18;《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1996年);及《五年之后:反思历史的终结(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Years Later)》,《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34:2(1995年),27-34。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纽约,1996年)。

统的影响。这些情况引发对全球化的反感,从而抵制全球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同质化。这些抵制有时还诉诸暴力。

下面讨论史学(historiography)在这一新形势下的主要发展。我们可以大概辨别出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历史作品中的五种潮流或者五个中心问题,1) 引发所谓“新文化史”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cultural and linguistic turn)仍在继续;2) 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日益扩展;3) 后现代主义批评语境中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之间新的联合;4) 与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研究相联系而对民族国家史学(national historiography)的批评和挑战;以及5) 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兴起以及与二者相区别,全球化的历史。尽管今天历史写作方式有这样一些主要的潮流,却仍然没有产生主宰历史研究的新范式(paradigm)。事实上今天的历史研究存在着相当多的内部之间的差异。尽管所有这些潮流都挑战在近现代以来大多数时间里支配历史学家兴趣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民族国家仍然在历史书写中得以存留,虽然究竟什么是“民族”的定义已经有所改变。

1945年以后在北美和西欧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所谓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而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科学理论偏重大框架的、无个性的结构与过程(large scale, anonymou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的分析,以致忽视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经历。二是现代化理论假设世界将按照西方所确立的模式走向现代化。三是社会科学主要采用包括定量在内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相信这些研究能够提供客观知识。语言学理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便把历史看作是一种文学形式。这就有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批评。怀特“用最显白的形式来看待历史叙事,将之视为一种文字虚构,以发明(*invented*)而不是发现(*found*) (怀特的斜体)为特征,因此更接近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尽管这些对社会科学的批评一度非常流行,但社会科学方法不仅在1990年代及以后继续保持其吸引力,而且还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同时社会史也更加意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主张用适合文化的研究方法来补充经验和量化的研究。

## 一、文化和语言学转向

1990年以后文化转向和更小范围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继续对历史理论和历史写作发挥重要影响,并且其影响范围并不仅限于英美。但否认社会的真实性,认为对所有社会生活进行所谓的科学解释都不过是“集体虚构和神化创作的演练”的极端认识论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在1990年以后显著衰落,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极端文化主义无法理解世界在1990年后所经历的现实改变。琳·亨特(Lynn Hunt)于1984年的《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文化分析推动了文化研究,但她自己并未否认结构和过程在引发法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1999年亨特与维多利亚·E·邦内尔(Victoria E. Bonnell)合作主编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分析从1980年代以来社会与文化研究体现出的各种新方向。他们的结论是:“虽然文集中的作者们都受到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但他们拒绝接受最激进形式的文化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暗示的那种无视社会的现象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选自他的《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T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巴尔的摩,1982年),82。

同前。

见维多利亚·E·邦内尔和琳·亨特主编:《导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伯克利,1999年),3。

同前,11。

(the obliteration of the social)。”只有海登·怀特在《超越文化转向》的后记中以及2007年5月所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还坚定地保留激进文化主义的立场。

类似的重新定位也出现在语言学转向中。嘉伯瑞尔·施比格尔(Gabrielle M. Spiegel, 1943 - )在强调语言决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直强调语言的社会背景。施比格尔在2005年一本收录语言学转向主要代表性论文的文集中总结道，“在‘语言学转向’25年的实践后，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对过度系统化地解说语言在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中的作用表示反感。”在文化史的研究扩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过程中，其内含呈现出一些不同，显示了一种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东亚，文化史的实践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史学范式之外的选择，这在某些情况下能使他们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使史学家有意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史学者面对这种复杂甚至有时让人绝望的意识形态遗产的办法之一是检讨公众层面上战争记忆的形成和变化，或者“记忆”和“遗忘”的动态关系。为此他们不仅研究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传播，而且分析在博物馆中保存和展出的战争物质遗存，以及战后在广岛和长崎树立的公众纪念碑对形成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

如果说日本文化史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在史学家群体内的国际性跨文化交流，这也同样适用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的变化。例如2004年开始出版的“新社会史”丛书，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密切合作的成果。在海峡对岸，近几十年间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显示出对文化史的强烈兴趣，这得益于台湾史学家和他们西方同事更频繁的交流。与中国大陆的史学家相比，台湾史学家对西方史学的影响更为敏感，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台湾史学圈就由年鉴学派激发开始了文化史转向。大陆对文化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文化热”引发了社会史研究，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变化产生出更大的兴趣。社会史研究成为原先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一种选择，因为吊诡的是，后者通常侧重对民族和社会主义精英的丰功伟绩进行赞颂而忽视社会下层的历史。“新社会史”的编者把他们的丛书称作“新社会史”而不是“(新)文化史”，也明显地是要在发展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大陆的特点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潮流都让尤其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在意识形态许可的条件下，探索史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

## 二、女性和性别史

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化史方法相当适用于包括妇女史在内的自下而上的历史。1980年代以来，不仅妇女和性别，人种、民族和阶层都在史学写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妇女、性别和性的关注在1990年代西欧、拉美、印度、东亚和中东的历史写作中都获得重要地位。不过这一点在

同前，11。

“后记”，同前，315 - 324。在这里他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比历史学受这个幻象的影响更大，这个幻象认为事实是从研究中发现的，而不是由叙述模式和谈话技巧建构的。”见页322。他在2007年5月15号于意大利菲耶索莱欧洲大学研究中心(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iesole, Italy)举办的主题为“走向全球史(Towards a Global History)”的研讨会上，在《另一种全球性宏大叙事？(An Alternative Global Master Narrative?)》演讲的结论部分，给专业历史学贴上了“彻底失败”的标签，因为专业历史学仍然不承认所有所谓的客观历史研究，其实除意识形态外再无别的特性。历史学必须重新获得修辞特性。怀特甚至更进一步走入科学领域，评论说进化论理论是建立在对达尔文意识形态(Darwinian Ideology)不加批判的接受基础上的，这种意识形态设想自然界中存在着关联和运动，但应该被对突变的认可所取代，这一认可不包含进化理论所固有的渐进式发展的假设。

嘉伯瑞尔·M·施比格尔编：《实践的历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历史书写的新方向(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纽约，2005年)，3。

富山一郎(Tomiya Ichiro)编：《记忆开始讲话(Koku ga katari hajimeiru)》(东京，2006年)。

见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1995 - 2000》，(台北，2002年)；以及氏著《解构与重构：近20年来台湾历史意识变化的主要趋势》，《汉学研究通讯》，25：4(2006年11月)，13 - 32。

美国最为显著,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相比。表现之一就是2007年7月的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的议程安排,其中的很多论题都反映出对妇女和包括男性在内的性身份的关注。论题涉及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包括奴隶制度的性问题。对这些论题的处理同时都采用跨国的、全球视野,对非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在这种视野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同时嵌入对性的关注。这些论题反映出广阔的比较的全球视野,但是几乎找不到对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关注。可能该领域的史学家会否认这一点,会强调他们的“权力”概念是高度政治性的,妇女史或性别史都是关于权力等级的。但仍然可以说这种史学大都不太关注权力运作的政府和经济意义上的制度框架,它们被看作是传统上的男性领域。这个局限性也存在于“全球视野中的妇女和性别史(Women and Gender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丛书,涉及“家庭、宗教、人种和民族”,包括9个专题小册子,由邦妮·史密斯(Bonnie Smith, 1940 - )主编,由美国历史学会的妇女史委员会出版。史密斯写道:“如果说1970年代带给我们的是过去妇女的历史,1980年代让我们知道了性别史,那么在上个千年的最后十年,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对妇女史与性别史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的需求就变得突出了。”事实上1990年代社会史的扩张已包含了妇女和性别,对妇女的生活状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还跨越国界,包含了对从前殖民地社会妇女状况的关注。

这些对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关注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批判,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部分延续,但后一点却很少被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受到排斥,但常常只是部分排斥。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史学都含有一个政治意向作为前提。它强调一开始妇女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迫从属于男性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这种从属和剥削又得到强化。女性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把它任务定义为在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取得女性生活各个方面的解放。1990年代妇女史和性别史沿着新的把性别角色问题放在中心位置的史学潮流发展。1990年以后的史学另一个关键方面是由下而上的历史的拓展,现在不仅扩展到性别史,而且包括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发端的下层史。它们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反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二十世纪都持有的一种信条,那就是西方文明最终是对非西方世界同样有效的标准样式。因此后1990年代代表史学潮流的女性主义史学转向非西方世界,关注后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包括性别之外的种族和民族问题,以此作为它观照历史的一个视角。在美国之外,尤其是在印度和拉美,历史研究也有新的突破,表现出那些在美国史学界相似的方法论和史学理念。

中东的女性主义史学或者说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除了质疑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之外,还对民族主义史学中的本质主义方法提出挑战,这种本质主义倾向于在历史研究中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对立起来,视其为两个独立的范畴。中东女性主义史学提倡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交织进行更加敏锐和完善的研究,这要通过关注妇女的历史经验来实现,既研究欧洲移民,也研究殖民地的妇女。对当地妇女而言,虽然她们从殖民地反对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得到了好处——例如进入学校或者参与政治生活——但她们经常被要求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国家需求之下,在民族独立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换言之,在政治权力从欧洲人手中转到民族主义者手中之后,根据性别来划分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做法仍然在继续。女性主义研究这样便有力地反抗史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揭露它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东亚妇女史研究也同样表现出对这种持久的、霸权地位的西方文化和政治影响的关注。尽管亚洲的女性主义学者承认他们在提高本国妇女权利和利益的努力中受到了西方的启发,但他们也通过关注亚洲妇女与西方妇

邦妮·史密斯,见玛瑞丽尼·辛哈(Mrinalini Sinha),《性别与民族(Gender and Nation)》,《全球视野下的妇女史和性别史(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美国历史学会妇女史委员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6年),vii。

朱莉娅·克兰希·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中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史学:妇女、性别和帝国(Twentieth-century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Middle East: Women, Gender, and Empire)》,见格什尼(Gershoni)、辛格(Singer)和艾尔丹(Erdem)编,《中东史学(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ies)》,(西雅图,2006年),70-100。

女经历的关键差异来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范式的影响。

### 三、重新定义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联合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1990年以后主要杂志的变化,将之视为史学潮流改变的标志。以社会科学方法的复兴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法国《年鉴》杂志的重新定位。1994年《年鉴》把副标题从《经济、社会与文明(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改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改名的理由是以前的副标题过于狭窄,史学家不仅应该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切合作,还要与其它的学科门类和人文学科密切合作。事实上《年鉴》一直是这样做的,现在只是重申这一点。《年鉴》1988年和随后1989年两篇编者按已经提到传统社会科学的危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量化研究已经不能给史学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基础。这等于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再可信,史学家需要克服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鸿沟。这与其是说要拒斥所有的社会科学,抑或某些社会科学门类,不如说是要进一步开拓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重视此前所忽视的、与文化诸多方面有关的社会科学。这就要求有新的方法,不仅仅是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曾是《年鉴》史学的核心领域的方法,还需要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和政治哲学的方法。

1990年以后的史学还有一个显著的重新定位,那就是强调文化和语言,但却远离1970年代和1980年代流行的极端文化主义和专注语言的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这在1974年成立于美国的国际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1976年这个协会的刊物《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诞生,在第一篇编者按中编者便强调把跨学科研究作为学会的主要关注之一,并向“合适的定量分析”开放。1999年该刊发行专号,讨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转向在重塑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中的影响,编者评论说这种影响已经变得“混乱”。在承认方法的多元化的前提下,专号的作者寻求联结社会科学分析和文化研究的可能办法。1990年代欧洲社会科学历史学会(Europea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在美国成立的国际社会科学历史学会后成立,并从1998年开始举办两年一度的学术会议。2006年它的会议上宣读的正是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潮流相符合的文章。论文论题集中在非西方世界——非洲、亚洲、拉美,集中在民族和移民、性别和性向、家庭和人口统计学、劳工、社会不公、民族和民族主义,以及政治、宗教,还有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理论问题。在为2008年会议征集论文的声明中,这个学会表示它“旨在聚拢那些有志于用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现象的学者”。这次会议和这个学会,由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提供资助,扩展了社会科学的范围。与很多后现代文化研究的鼓吹者不同,它们的作者继续强调分析的社会科学的重要。

这里应当讨论一下对社会科学方法的需求,1970年代和1980年代文化和语言学转向贬低社会科学方法,但对分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全球性方面和区域性差别而言,它们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然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已发生了变化。它已超越了对可量化处理的宏

高彦颐(Dorothy Ko):《妇女史:亚洲(Women's History: Asia)》,见凯利·博伊得(Kelly Boyd)编:《历史百科全书与历史写作(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伦敦,1999年),第2卷,1314。

《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个批评的转折点?(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年鉴》,第43卷,第2号(1988年3-4月),291-293;及《历史与社会科学:尝试实验(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Tentons l'expérience)》,《年鉴》,第44卷,第6号(1989年11-12月),1317-1323。

《编者前言》,《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1:1&2(1976年秋季)。

见该专号首篇保拉·贝克(Paula Baker)《社会科学历史究竟是什么?(What i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nyway?)》,《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23:4(1999年秋季),2-5;另埃里克·H·蒙克农(Eric H. Monkkonen):《社会科学历史的教训(Lessons of Social Science History)》,《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18:2(1994年夏季),161-168。

观的历史和社会中的结构和过程的狭隘关注,扩展到可以包含各种涉及阐释的文化因素。只是阐释并不一定非要意味着吉尔茨式的直观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而是涉及一种研究逻辑,这种研究逻辑需要明确定义问题所在,从而可以分析被分析之社会—文化内容。这也意味着从这种研究中获得理论要经受学者共同体的检验,依据的则是共同认定的科学论证有效性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经受住了文化和语言学转向的批评,并且对全世界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变迁做出了回应。

目前的史学形成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向,一个是文化学转向的继续,它对历史的延续性和结构表示怀疑,提倡使历史学接近于想象的文学的方法;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史学,结构和发展是历史的关键性要素,它提倡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尽管很不幸,二者迄今一直相互排斥,它们本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虽然社会科学家已经广泛地论及全球化,但是对与之相伴的差异性的研究,以及对全球化引发的抵抗的研究都还很不够。这是史学家需要发展特长的地方,因为对全球化的经济方面的强调——像占全球化研究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学所做的那样——已经倾向于将经济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1990年代以后的史学与此前明显不同。但它必须避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贯穿于兰克学派、实证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经验社会科学学派、文化学派和语言学转向的支持者的幻想,以为他们能对历史的进程提供明确的解释。

#### 四、对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新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转变如何影响着民族主义史学的写作和研究?民族主义史学集中于民族国家这一点在东亚和东欧仍然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在东欧就非常具有生命力。对全球化的兴趣也不再像过去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全球化理论中那样仅局限在西方,而变成国际性的了。

但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尤其如此,例如《美国历史国家课程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ited States History)》和《世界史国家课程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World History)》就放弃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允许全球性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美英两国所有的重要社会科学杂志,《年鉴》与《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杂志,俄罗斯的《奥德修斯(Odysseus)》杂志,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在》(Passato e Presente)杂志,以及德国的《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虽然全球史的研究还比较少,但都已转向跨国性研究。

在印度,下层研究发端于这一遗产,企图超越像民族国家这样的单一解释框架。人们承认民族主义的历史是作为反殖民历史出现的,但是对下层群体真正的“实地”研究已表明,他们的政治与民

索林·安托希(Sorin Antohi)主编:《自由叙述: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Narratives Unbou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布达佩斯,即将发表),也可见丹妮拉·科勒娃(Daniela Koleva)与伊凡·伊伦考夫(Ivan Elenkov)合著:《发生变化了吗?保加利亚的后社会主义史学(Did the Change Happen? Post-Socialist History in Bulgaria)》,见乌尔夫·布伦堡尔(Ulf Brunnbauer)主编:《(重)写历史:社会主义之后的东南欧史学((Re)Writing History: Historiography in Southeast Europe After Socialism)》,(明斯特,2004年),94-127。弗兰克·哈德勒(Frank Hadler):《龙和降龙的人:二战后东欧史学中民族史的定位问题(Drachen und Drachentöter. Das Problem der nationalgeschichtlichen Fixierung in den Historiographien Ostmitteleuropa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见克里斯托弗·康拉德(Christoph Conrad)与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合编:《民族写作:国际比较中的历史学(Die Nation schreib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哥廷根,2002年),137-165。

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全球史:全球争论(Global History. Global Debates)》,见《跨国史(Geschichte Transnational)》,3:3(2004年)。

1995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国历史教科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story in the Schools)编写。

族主义精英所关注的常常很少关联。下层研究已经表明,主流的反殖民主义写作曾为了让民族统一具有优先性掩盖了“民族”内的紧张和分歧。这在学者中引发了一场正在勃兴的运动——探索“别样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也就是基于当地文化传统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于是就有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交叉空间的研究,以此来进一步充实对全球化的文化维度的研究。不过一条分开局部现代性体现出的具体差异和旧的民族主义思维的模糊界限仍然存在,以致引起殖民话语/本土真实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等批评世俗主义是一种西方观念的学者而言,他们从对世俗主义的批评走向具体地反对被认为是宗教宽容(并不是非宗教的)的印度世俗主义观念,并且给印度教右翼提供养料,帮助他们建立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致仅认同印度教的这种特殊形式。后现代主义者和社会结构主义者对于所有知识的“真实性”和“文化联结”的根基性争论,赋予印度教的宗教狂热行为以额外的武器,尽管印度的后现代主义左派们坚决反对此种滥用。

中东的民族主义史学虽然受到女性主义学者和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在历史实践中它仍然影响深远。这部分是因为当地与西方的冲突已经凸现出民族主义的重要性,部分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史学遗产——由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文献的存在,史家埋首其中,从事帝国或民族层次和地方层次的政治史研究也就自然而然的得以继续兴旺。不过当地的史学家也有试图超越民族主义史学标准形式的尝试。例如,1915年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放逐和屠杀,传统上被视为一种虽然不幸但却是正义的行动,因为人们认为它强化了民族一致性,有助于获得民族统一。近年来新一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对该事件做出了各异的不同解释。他们的努力被看做是具有“后民族主义”特征,与民族主义史学家所一致具有的辩护性叙事不同,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土耳其社会是一个有很多社会集团、民族集团和不同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多样化群体,每个集团和宗教信仰对于现代土耳其来说,都是同样有价值的。这些史学家开始提供一个对因为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进行负面描述的世俗民族主义历史作品进行批评的视角,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来解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如何给亚美尼亚人带来痛苦和不幸”。

民族主义史学在东亚和东南亚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类型,对史学家和史学教育者还保持着持续的吸引力。韩国和越南近几十年的经济膨胀在史学家群体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动力,希求在史学写作中寻求提高民族国际威望。但是在史学专业中,也开始出现挑战民族主义史学写作统治地位的尝试,原因可能在于史学新潮流的传播和对史学新潮流兴趣点的关注,例如妇女史、文化史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这方面日本史学家在他们的亚洲同行中表现最为显著,这要归功于冷战后日本全国范围内对“国际化”的主动追求。2006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图书,通盘检视全国范围内历史研究领域的状况。这部书与早先的类似著作不同,反映出日本国内史学家与美国同行之间的国际合作。第一卷由任职于康奈尔大学的酒井直树(Sakai Naoki, 1946 - )主编,标

例如迪里普·帕拉麦施瓦·高恩卡(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编:《别样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北卡,2001年)。从现代性在特定的文化中展开的前提出发,这一卷的论文就澳大利亚的土著法律、孟加拉国的话吧和上海的市民等差别极大的话题讨论现代性问题。

参看阿尔让·阿帕都莱(Arjun Appadurai):《一般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1996年)。

克兰希·史密斯:《中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史学》,87-88。

法特玛·穆各·戈舍克(Fatma Müge Göçek):《阅读种族灭绝:关于1915年放逐和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史学(Reading Genocide: Turkish Historiography on the Armenian Deportation and Massacres of 1915)》,收录于格什尼、辛格和艾尔丹的《中东史学》,121-122。

《历史写作方法》(Rekishi no egakikata)这套书的总主编是广田正树(Hirota Masaki, 1934 - )和卡罗尔·格拉克(Carol Gluck),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知名的日本教授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前任主席。东京大学出版社此前出版的类似书籍包括8卷本的《日本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现状(Nihon ni okeru rekishigaku no hattatsu to genjo)》,(东京,1959年),和8卷本的《日本史演讲系列(Nihon rekishi koza)》,(东京,1968年)。

题为《超越民族史(Nashonaru hisutori o manabi suteru)》,努力探索史学家可以借以超越民族史范式而取得对过去的新理解的方法。

## 五、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历史

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对世界史和全球史日益关注。20世纪前半段的史学家曾经尝试世界史的写作,最著名的像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作品,集中比较不同的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作品受到职业史学家的轻视,因为它们不是扎根于可靠的学术研究,而是基于宽泛的原则性概括。不过他们认为其它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对历史思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的后半段见证了世界史的复兴,这一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共同体社会的转变更使其得到强化。较早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学术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是1963年出版的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虽然与它的标题不很对应,这是一本比较性著作,为后来的世界史写作建立了一种模式。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以后的世界史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发端较早,1970和1980年代由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科学家,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其它部分的影响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肇端。像现代化理论家那样,他们把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作是理解现代国际共同体社会的关键,不过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增长是建立在剥削那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增长阻碍着这些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和被掠夺。种族主义和妇女的从属都源于经济剥削。1990年以后这段时期,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都失宠了,然而在我们对全球史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它们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

麦克尼尔代表了第二种方向,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兴趣更弱,也较少直接地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同时愿意包括更早时期的历史。这些观念也是得到国际支持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0年创刊的基础,当时由杰瑞·本特里(Jerry Bentley,1949-)任主编。这份杂志成为新世界史的最重要喉舌,并刊登相关书评。正如在每卷的第一页所标明的那样,杂志的目的是为了“从全球视角”分析历史,把“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波动,技术的跨文化转移,传染病的流散,长途贸易,以及宗教信仰、观念和理念的传播”作为关键性主题。对这些主题的强调仍然在大量世界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

1990年以后的这段时期里,全球史这个术语明显流行起来,2006年《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

关于世界史的不同形式和最近史学思想与研究中不同形式世界史的发展的讨论,见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在世界历史中遨游,历史学家创造出一个全球的未来(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纽约,2003年);和虽然简短但是精炼的杰里·H·本特里(Jerry H. Bentley)《全球史》,见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编:《历史著作的全球百科全书(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纽约,1998年),968-970,并氏著《新世界史》,见劳埃德·克莱莫(Lloyd Kramer)与莎拉·玛萨(Sarah Maza)编:《西方历史学思想手册(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马尔登,马萨诸塞州,2002年),393-416;另见夏多明:《全球史和对西方视角的批评(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纽约,1926年)。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2卷,(牛津,1934-1961年)。

见杰里·H·本特里(Jerry H. Bentley):《20世纪学术中的世界史形态(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华盛顿,1996年)。



Global History)》也创刊了,尽管在《全球史杂志》的前三期里,《世界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两种杂志以及世界史和全球史概念的区别都还不是很清楚。对于全球史如何准确定义,以及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可以谈论全球史,都还没有一致意见。“全球史”的概念与“世界史”有所重合,而且常常被认为与后者一致,但“全球史”往往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探险后的历史,而且经常涉及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可以包括对前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其实上述两种杂志都对此类研究感兴趣,因此可以讨论比如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很久太平洋区域内的商品交换、饮食与疾病情况。这在史学实践中意味着史学家更多地跨越民族界限,讨论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不过气温和环境在早期史的比较研究中尤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对1990年以来主要相关杂志及其所评论的书籍的研究可以证明这种世界史或全球史转向。一些社会学家(其中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全球化以及它对现代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主要方面的转化作用已经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并且说我们现在正在从民族国家的时代向全球化的时代前进。尽管可能产生跨国政府(欧盟是这里最有力的例证),但民族国家事实上不但根本没有消失,它的作用甚至还在加强。这种民族国家的复兴对史学的影响仍不清楚。尽管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包括仍在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和越南,但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带来政治、文化哪怕是经济的同质化。

全球史可以涉及各种历史时期,当然不能等同于全球化的历史。前者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包括西方,因此也不必要涉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后者研究的是一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加精深的处理现代化的方法,并不局限于西方,但是与西方密不可分。全球史并不要求一个关于历史发展的明确的理论,并不要求宏大叙事,一般而言全球史排斥后者,因为那是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累赘的一部分,而全球化的历史则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它并不必然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进步的。

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显然需要考虑当地传统及其特殊的文化特性,后者也影响着现代世界的变迁。目前史学家确实转向了跨民族和跨文化的历史,转向世界史和全球史。但他们极少讨论全球化的历史,包括全球化的目前位置以及它的走向。全球化的研究已经大量出现,但它们仍然主要出自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手笔。令人惊讶的是,史学家几乎对此漠不关心,其中也包括了《世界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的作者们。如果把焦点集中在经济的层面,会造成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的片面性。最近发表在《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的一篇评论全球化史研究著作的长篇文章已经揭示了这一情况。现有的全球化研究,对其社会效应关注极少,对文化效应则研究更少。让人吃惊的是,这篇发表史学杂志上的文章居然很少谈及史学家的工作。其实史学家可以注意几个重要专题。如最近十五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符合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反而表现为对现代条件和现代习惯的暴力的抵制。这些现象是需要强化分析的。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同质化,甚至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其实,全球经济在任何地方的扩张都经历了来自于当地的传统、习惯和见解的对消费模式的修正。正是在这里史学家可以大显身手,将全球化过

安东尼·G·霍普金斯(Anthony G. Hopkins):《全球化的历史——以及历史的全球化?》(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History),见霍普金斯编:《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伦敦,2002年),11-46。

见夏多明:《全球史和对西方视角的批评》(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乌利希·贝克:《全球化是什么?》(What is Globalization?),(剑桥,2001年),转引自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全球化,大区域与民族国家》(Globalization, Macro-Regions and Nation-States),见布德、康拉德、杰兹编:《跨国史》(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21。

迈克尔·朗(Michael Lang):《全球化和它的历史》(Globalization and Its History),《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78卷(2006年12月),899-931;另见霍普金斯《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程所导致的变迁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

## 六、结论

回顾一下:1990年以后的世界史学,显现出历史思想和历史著述在延续前期的发展之外,又呈现出新的走向。我们已经提到1970年代历史思想中的突然转向,这次转向远离分析的社会科学及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信心,这种信心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历史发展进程的顶点,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典范。我们也提到新文化史的兴起,以及新文化史用阐释文化中深层意义的方法取代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方法。这次转向对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客观认识可能性日渐怀疑,希图消解传统社会科学所坚持的事实和虚构之间、史与文之间的界限。而其最激进的后现代形式,便否认历史知识的可能性本身,将其贬低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但是其中形成历史的社会背景在冷战之后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在继续,并伴随着相应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无论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相当程度上占据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科学,还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取代传统社会科学的文化主义和语言学转向,都不能理解最近15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两种倾向在方法上都是单向度的,传统社会科学忽视了局部的多元性和本土文化模式,文化主义不考虑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制度背景,包括目前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背景。而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灾难与社会变迁的理解,如对于法国革命和苏维埃革命,工业化进程,或者是殖民运动的理解,看起来都不能脱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全球化过程似乎证实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也就是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同质化。然而在1990年以后的这段时期里,事实上的重大事件过程却与现代化理论的期待背道而驰。后者设想在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将会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强化、见解世俗化和政治民主。这意味着西方的发展将会为非西方社会提供典范。然而1920年代和1930年代独裁主义占据着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表明这种模式甚至对西方也难以适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军人专政推翻了最初的议会政体。在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和民主政体的模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了,不仅像此前在印度和日本这样的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来,还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确立起来,尽管激烈的内战和种族冲突仍在那些地方继续。卢旺达和达尔富尔(Darfur)已经表明种族屠杀并非已成往事。日渐兴盛的原教旨主义是对早先的世俗化潮流的反扑,不仅出现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出现在印度。甚至在中国、美国、波兰和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原教旨主义也成为一种潜流。的确,国际合作与交流正在扩展,于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指出,全球化等于“非国家化”。但他的预测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民族主义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持续有影响。

换言之,受到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影响的复杂的世界对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后现代对历史的认识,认为历史基本上是一种想象的文学形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而由于不同的原因,微观史学的实践也无能为力。即使微观史学所描述的故事反映社会真实,它仍然故意无视对社会变革的粗线条描述。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要求的是能够考虑到我们现在生活和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的主要变化的研究方法。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这需要认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异,也就是在同质化的强大压力下仍然保持不变的不同世界观。”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分析手段就是必不可

乌尔利希·贝克:《全球化是什么?》,(剑桥,2001年),转引自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全球化,宏大区域与民族国家》,见布德、康拉德、杰兹编:《跨国史》(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21。

阿里夫·德里克:《混淆隐喻,世界的创造:世界史为什么?》(Confounding Metaphors, Inventions of the World: What is World History For?),见本笃·司徒赫特(Benedikt Stuchey)和埃克哈德·福克斯(Eckhardt Fuchs)编:《书写世界历史:1800年-2000年》(Writing World History, 1800 - 2000), (牛津,2003年),133。

少的,如果缺少它们,任何有意义的全球史研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分析手段需要超越传统美国社会科学、布罗代尔的《年鉴》或者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结构和过程的关注方式,需要考虑对形成我们当前世界起到如此关键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之中的复杂性和冲突。我们在上面简单总结了全球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各种努力,但这些发展是否一定会导致历史学领域内的变革,现在还无法过早地下结论。但是所有这些发展可能已经指向了对于一种历史写作新方法的需求,为全世界很多史学研究者所认同,那就是我们不仅需要挑战那种常常被欣然接受的、认为西方的模式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并且将其影响辐射到世界各地的看法,而且还要超越很多出发点不错的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研究,但却受制于西方/非西方二分法的思维。我们追求的是,用多元、多极的全球观点的描述、分析世界范围史学的变化,并认识到史学演变的动力来自世界的各个地区,也在世界的各地的史学实践中表现出来。

(李渊 王献华译)

## 稿 约

一、本刊欢迎有关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发展史研究的稿件。

二、文稿长短不拘,8000字左右的文章尤所欢迎。“史林偶拾”请写简短些,集中写一个问题。本刊对来稿有时须作必要的修改,如不愿修改,请说明。作者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对问题的看法;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坚决反对剽窃、抄袭的行为。

三、来稿请用16开小稿纸,打印稿用A4纸,注释请用脚注,即注于每页之下。文稿字迹不清,或注释不合要求,本刊请人誉写、处理,费用从作者稿酬中扣除。

四、本刊从2000年第3期起,实行匿名审稿制。来稿请附作者情况介绍,包括姓名、出生年月、籍贯、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但应另纸书写,正文与注释中不能出现与作者背景有关材料。来稿请寄《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不要寄给个人。务请作者遵守上述要求。

五、来稿请附200至300字的中英文摘要。引文一定要核对原文,做到准确无误。

六、来稿发表后,即寄付稿酬。请作者自留底稿,未被采用的文稿,不再退还。作者寄来的稿件如半年未被采用,也未接到本刊编辑部的函件,可自行处理文稿。从1997年起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如作者不同意录入,请说明。